·学术史谭·

《学术界》(月刊)
总第204期,2015.5
ACADEMICS
No.5 May. 2015

# 《独立评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有益探索

○ 陈二祥
(安庆师范学院　政治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20世纪30年代,聚集在以《独立评论》为平台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提出了一些问题及解决思路和措施。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各抒己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局的决策,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关注,也为当代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独立评论;现代化;农业乡村建设

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内忧外患的现实促发了人们的现代化意识,1932年5月由胡适担任主编的《独立评论》成为知识分子积极诠释中国现代化的言论阵地。而《独立评论》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 一、"独立"精神下的"文人论证":《独立评论》之宗旨

1932年5月,在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深重的背景下,胡适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在引言中开宗明义倡言:"我们把这刊物叫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常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1]这种"独立"精神寄托了胡适等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利用报刊走向社会"中心"的美好愿

作者简介:陈二祥(1968—),安庆师范学院政治学院研究馆员,法学博士。

望,以负责任的言论,通过办政论的刊物,带动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近代中国面临社会的转型,使原本士的阶层蜕变为处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热衷于重新走向社会“中心”的努力,以胡适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想凭借近代报刊这个作为西方文明的产品去体现“文人论证”,企图走向“中心”的心态体现在教育、文化、学术方面:首先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受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桎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缺乏的是各类专门人才,向西方学习,培养各种技术人才,只能依靠现代教育,要彻底摆脱传统教育的阴影。其次认为中国教育党化倾向严重,“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他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经里去;而教育事业,则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他完全受党指挥。”[2]对于国民党政府党化教育的危害,叔永先生认为:“一则对于基础教育,小孩的心灵发展有重大的妨害;二则对于一般教育而言,钳制了思想,实质是专制思想,是与自由思想相对的”,所以,如何处理党化与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不能并列,有党化,就不会有教育,反之,要有教育,就应先取消党化,即使要有党化也应先发展教育。《独立评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讨论的范围十分宽泛,包含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事实上《独立评论》也是一份政治性比较强的新闻周刊,刊行前后五年,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大量言论来看,许多都体现了一种政治态度,由于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干涉,真正的“独立”精神很难实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无法置身事外,期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所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受蒋介石的征派,胡适也奔赴国难,去国外宣传,以争取多方支持,当起过河小卒。”[3]胡适等放弃了一直坚守“不依傍任何政党”,寻求“独立”精神的底线,走上了文人论证的道路。

## 二、“独立”语境下的政治主张:《独立评论》之归宿

1928 年到 1931 年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许多关于“人权”、“宪政”类的文章,严肃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然而到 1938 年胡适却公开拥护蒋介石的统治,这与胡适作为“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政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4]大相径庭。而这种转变正处在《独立评论》刊行的 1932 年 5 月至 1937 年 7 月之间,这也是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从严重对峙到声明拥护的转变时段。

为什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会跨越自己标榜的“独立”精神,转变成理解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从政治思想史看,这是知识分子理想的民主政治与民族主义的冲击过程中,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表现,表现在胡适政治理念——自由主义的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胡适希望坚守自由主义的理想,然而政治现实又迫使他参与现实政治,这一行动选择影响并改变着他的政治态度。

可以说,《独立评论》从崇尚“独立”精神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走向多元、多重面向,所反映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自由主义,而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矛盾、

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胡适在政治上的独立态度最终向国民党政权倾斜,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者在处理民族与民主关系问题上两难境地的折射,他最终选择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不得不暂时放弃民主努力的一种妥协表现。”[5]在《独立评论》刊出的五年时间里,胡适并没有放弃“独立”精神的理想追求,在政治上依然主张个人主义、私有制、思想多元化以及西方民主宪政政体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但现实政治和政治现实又使其思想的天平已偏向了民族主义。

## 三、“独立”发展下的现代化农业:《独立评论》之探索

作为影响非常大的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蕴含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关注面广,涉及宪政、经济、教育、社会科学、现代化等方面。《独立评论》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这群知识分子中展开的激烈论争,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亿万农民的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农村状况如何?农民生存生活境况怎样?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的发展,他们以《独立评论》为平台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设计,从研究中国乡村建设方面的相关问题入手,思考农业大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了一些解决中国农村和农业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一)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何者优先问题的探索

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强烈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但不反对发展农业,只不过认为光靠发展农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而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主张振兴农业、建设乡村文明,从而刺激民族工业兴起,以期建设自给自足的乡村工业,走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郑林庄则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

吴景超是坚持以工业化救济农村一方的旗帜型人物。他认为中国目前“只有一条路是活路”,那就是“努力走上工业化的道路”,“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而别种实业方面的人口加强。假如在这些成绩之外,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那么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的加增”。[6]他同时还提出了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三大办法:兴办工业、发展交通和扩充金融机关。这些观点引起了巨大反响。针对反对者的意见,吴景超于 1935 年 1 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以“澄清”从事农运工作者的“误会”,重申工业化论,坚持认为“农村中已无路可走”,主张发展工业要知难而进,而不是畏难而退。[7]

贺岳僧认同吴景超的基本看法。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有效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给予大多数人以福利。他指出工业化是中国“挽救经济厄运的惟一办法”,是“走上近代化的惟一直道”[8],认为“我们现在

所需要抵抗的不完全是帝国主义,而是促成帝国主义之所以发生的优良的生产方法,我们要尽快利用机械生产来代替手工生产”,“现在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复兴农村可以解决得了,而是要尽量的采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应用于生产事业,以促进整个事业的繁荣”。[9]

陈序经是30年代“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大论战中“全盘西化”论的著名代表,主张工业化与都市化,“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使能调和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化。”并特别指出:“西洋农业之特别发达,还是在工业发达之后”,“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产出路也成问题”。[10]同属以工济农派的张培刚认为,“想要迎头赶上人家,就非顺着大势,增加演进的速度不可”。主张中国应该统制全国经济,全面地、迅速地实施工业化。[11]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则认为,应把发展农业置于优先地位,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乡村的翻身需要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但关键则看能不能工业化[12]。认为商业的工业道路不仅无法满足多数人吃饭的问题,不会使民族工业资本成功,而且会使中国社会关系的增进和调整受到妨害,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人才钱财充于都市,乡村衰蔽无人问。梁漱溟还认为,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是从农民生活需求出发,志在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造,既不同于当时日本提倡的工业到乡村去,也不同于马寅初等提倡的以小工业和手工业补足农业,因为前者骨子里是维持工业资本的立场,后者则只是局限于对乡村的考虑,没有考虑整个中国社会的根本大计。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侧重社会主义的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如何工业化,普通说有两条路。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现在的中国人大抵都想走中间(我们也然),谁也不敢说走一边的话。而其实呢,骨子里都侧重第二条路(尤其政府中人为然);唯我们则真是侧重第一条路的。从反对资本主义来说,从要完成社会的一体性来说,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是一种社会主义;那么,在工业化问题上能不能实行其统筹建设,就是我们之成功失败所攸关的了”。[13]

与梁漱溟观点相似的还有姚溥荪。其观点同样也是坚持先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然后再工业化:“中国农村没落,即不足以激进工商业之发展,而消弭匪患,安定生活,澄平政治,又都为一般贫民迫切之要求”,“复兴农村则不独可以提高农村的购买力,帮助工业化……似为治本之要图”[14]。姚溥荪表示不反对工业化,但是认为工业化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有可能性。因为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实施“统制经济”和“保护关税政策”的“统一政权”[15]。如果不首先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则农村购买力低落,工业产品没有市场,国家财政也无安定保障,工业化不免陷入失败;更何况,农村破产急需救济。所以目前还是以复兴农村为要。

与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相比较,郑林庄的观点颇具特色。他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认为中国暂不具备迅速

工业化和都市工业化的条件,都市大规模工业化要具备经济自主、国际市场和科学意识三大条件。“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我们只能从这个落伍的农业社会逐渐地步入,而不能一步地跨入那个进步的工业社会里去。在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期,应该有个过渡时期来做引导的工作”[16]。工业经济应该由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中国须着手急图的是农村工业化。在农村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以作为建设工业的基础。都市工业重在机械利用,吸收人工有限;农民受了故土观念和知命观念限制,未必会背井离乡;都市工业所需要的大资本、大改造非中国一时所能办到。而发展农村工业,劳力与场地方便,不需要大量资本与技术;都市工业还可以由此萌芽。因此,都市工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百年大计,而农村工业则是目前救亡图存的急务。

这三种观点实际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和“第三条道路”的论争,尽管这三种不同的论争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缺乏深入的正确认识,但从思想认识水平上,国人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些言论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价值。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问题的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衰败是不争的事实。上述各派观点尽管在农业现代化的逻辑排序上有争论,但它们都关注如何救济农村、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并针对当时农业和农村的具体现实,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1. 关于土地问题的探索

关于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吴景超指出:“现在的农民,仍以自耕农最多,”“中国没有田的农民以及虽有田而不够的农民,仍占全民二分之一以上”,“为安定社会秩序起见,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有立即施行的必要。”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方案措施,他认为中国可实行丹麦的政策,即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不过捐税的征收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财政紧缺与用款浩繁永远是废除苛杂的障碍。鉴于此,吴景超在其《从佃户到自耕农》一文里指出:“中国实行丹麦的政策,有三点仍须注意。第一,政府应效法爱尔兰减租的方法,使地主肯将土地出售。第二,应以东欧各国的成例为鉴,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的价格,使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购买土地所需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17]。这一建议获得了广泛响应,吴世昌也在《独立评论》发文认为,“在现行的田赋制度下,即使无条件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也纳不起赋来……在田赋问题未解决之前,一切救济农村的工作只怕都是陆象山所谓‘支离事业’而已”[18]。

2. 关于农村人口问题的探索

人口数量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乡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吴景超指出,“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阻碍,这个阻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的人口数量。”“我们生活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庞大的人口数量,在这种观点之下,节制生育运动,是中国今日最有意义的一种运动”[19]。

巫宝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指出人口密度过高,人民过一种仅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造成“人口质量恶劣”。尤其严重的是,“低的生活程度与不健康的人口,在个人是无幸福可言,在整个民族也是一种恶运”。他认为,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的问题有三种途径:振兴工业、节制生育和移民城市,“在乡村,中国应该从戒除早婚与节制生育两方面着手。”并指出,“节制生育是解决中国乡村人口问题的最后武器:城市化解决乡村人口问题最困难的是中国大工业发达的可能性如何”[20]。

但钱实甫关于农村人口现状的看法稍有不同。他也承认,“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地的面积和农民的人数,都比较高出于世界各国。”既然有如此广阔的农地及众多的农民,按理来说,应该可以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然而他发现,现实的状况却并非如此。他认为,由于“天灾人祸的摧残”和“科学落伍的结果”,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劳动的不足”。这种“劳动的不足”分为两种:“一种是量的不足,一是质的不足。”“量的不足,很明显的即是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太少,”“质的不足,即是农业劳动者的本能过低”[21]。

对于农村人口“质的不足”,学者们纷纷提出应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钱实甫认为,“农业的劳动者固然多半是运用经历,但却不是丝毫不需要较高的知识”,而“知识的来源是由于教育。”但是我们反观中国的农村,“既没有实施强迫教育,也没有普遍的设置义务教育机关。”由于这种“教育程度的低落”,导致农业经营方式不能改良,无法制定合理的管理方法,从而阻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正如陈序经先生早年曾经指出的,“正是因为中了这种乡村制度的遗毒,和老子、孟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乡村的影响。结果是知识塞闭,科学不振,工业商业固无从发展,连作为乡村基础的农业,也是沿旧蹈常,与原始文化的社会的情况,相去不远……”[22]从而造成了旧中国的积弱、腐败。因此陈序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用先进文化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任叔永指出我国国内的农业学校都免不了两重的大失败,第一是不能造成农业专家,第二是改良的失败;并指明了农业学校的“农业教育的两点重要方面,一是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二是农业教育的结果,就是他的最大应用”[23];整个的农业教育,应该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是“学术的驾驭”,“其次是训练人才的教育”,“再次是普及农民的教育”[24]。郑林庄也提出了举办学校教育事业、举办社会教育事业以及创办科学研究机构和文化服务机构的三步走。

3. 关于生产技术问题的探索

劳作效率的低下是影响农民生活的因素。要建设中国农村,势必引用新式生产方法,应用机械。符致达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急待发展,但各有各的说法,其中被政府及社会一般人所最为注意的则为农村合作,尤其是农村信用合作。符致达肯定了农村信用合作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认为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根本办法,并不是信用合作而应该是“耕种合作”。“信用社固可使农民取得低利之资金”,但使农民“从事于旧式的或不合理的农业经

营,而不能用以购买农业机械而行大规模之生产。”故“欲发展中国之农村经济必须使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化,而欲使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化,则非使农民有耕种合作之组织不可”[25]。“耕种合作”的实行可以增加耕地面积,方便实施灌溉排水等工事的实施,扩大农业机械的应用,从而达到节省工作时间及劳力的效果,使中国农业生产力急速增加,使农产收获激增,农民生活长进。但费达生也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将“机械引用到农村中去,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由于中国习俗历经了千年,因而更为根深蒂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26]。

4. 关于政府管理问题的探索

针对当时因所谓的粮食过剩而采取的开办积穀的方法,董时进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方法的效用仅仅只是收纳目前所谓的过剩的粮食,储备起来以备荒年。但在事实上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所谓的生产过剩的效用却极为微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董时进指出“中国目前所闹的过剩,是局部的过剩,是因为生产地方的粮食,运不到消费的地方。”提出了要想救济农村,首先要做的便是发展交通运输业及相关事项,只有沟通生产区域与消费中心,才可以“使粮食可以顺其自然的道路流通,才不会郁积在生产地点。这样一方面可以救济生产者,一方又可以减少漏资,才不至于闹出一面苦过剩,一面买外国粮食的笑话。”[27]张培刚也指出,“靠天吃饭,农耕技术的落后,水利的失修是造成这些灾荒的原因”[28]。完善交通设施、建设水利等公共设施相关做为,无疑是属于政府的公共职能范畴内的。

“近数年来,国内朝野一致高唱救济农民,复兴农村,然而救济之声浪愈高,农民之破产者愈多,复兴之高潮愈未切实努力。”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董时进提出了有关政府职能方面的建议,“救济农村根本不在机关之添设,而在其运用。”认为如果政府将物资与人力运用得当,并且分清有关单位事局及相关社会团体的任务与职能,那么就可以使政府的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如若没有处理好相关方面的关系,那么添设机关来办救济的事情往往救济不成反而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农村的衰敝,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者少,而因为军事政治的原因却较多。认为,“许多地方当局只要能维持治安,自己不去扰民就够了。不然,即使施一点儿小惠,又何异乎将一个人紧紧捆绑,剥去衣服,再喂他一点儿米汤。”“救济农民,必须有真为农民谋利益及为农民而牺牲之诚意”[29]。

张培刚认为,由于军阀割据,造成战乱不断,“裁兵是行不通的,中央要维护权威,地方军阀要维持实力,扩充地盘,共产党和国民党要逐鹿中原,都不肯裁兵”。社会经济的萧条和战争的不断,使得农民的苛捐杂税由于养兵的需要难以消除。胡适也指出“救济农村有两条大路,一是积极的救济——兴利,一条是消极的救济——除弊,”具体来说就是裁官、省事、裁兵三件,并认为这是救济农村的先务之急。何会源认为“地方新政得减便减,不能减时中央政府应与以补

助”,同时“如果中央政府无款可助,他应当裁汰冗兵,节省糜费。……如果冗兵裁无可能,中央政府应当裁并骈枝机关,减低官吏俸给,以移省经费。”“如果俸给移无可移,政府创新税亦可不惜”[30]。

5.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探索

何会源指出,“真正病农的,不是田赋本身,而是他的附加税”。他将田赋附加的危害分为两种,“一是病农,一是妨害工商。”并且进一步指出,“田赋附加还将会牵连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对于田赋附加的原因,何会源认为是由于农民比较驯良,对于重税不敢反抗;旧税上附加,又比创设新税轻而易举;并且田赋是地方税,他们的税率可以自由增加。董时进也指出,“地亩捐也是与生产过剩间接有重要关系的,重税无疑在无形中又使农民遭受了一种损失。”并提出具体的方法:“各省田赋附加是否超过正粮的一倍,暂不管他,但以后无论如何,不再增加新的赋税,以后各省新增田赋赋税,事前必须请准中央政府,方得征收”[31]。

6. 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索

董时进指出,中国乡村问题的原因是农民太多,而农民太多是因为“大家没有别种事可做,只好挤在乡间种田”,而且“只要别种实业发达,农民便会从农业中踊跃地跑出来,同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变,也会不成问题。”工业化进程的落后和城市的不发达也是中国乡村问题未能解决的重要原因。因为无法发展更多工业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使乡村问题更为严重。董时进还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农村救济方案,即“救济农村不必专门在农村上谋救济是也。”强调人们在考虑农村救济问题上时不必将注意力单单放在农村这一点上,而应该从大局来考虑,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考虑,因为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割而据的部分,农村的发展不仅仅要依赖于农业本身,也要依赖于工业的发展。董时进更为详细地指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方法,将其分为技术与经济两种,“经济之方法在使农民之劳力能充分利用,且获得较高之代价。”提高农业生产力所赖于工商业之发展者最多。“工商业发展对于农民至少有两重利益:一为农产品之价格可以提高,二为创造工作机会,消纳过剩人口,其影响不但使农村之失业及浪费之劳动力减少,且可以增加劳动者之购买能力”[32],这样就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主要前提。

吴景超在关于怎样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中提出,应该“发展实业,把那挤在乡间的农民,疏导到都市中别的职业里去。”就怎样发展农业这一问题,吴景超赞成“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如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等等,疏导拥挤在农业中的人口,到别的实业中去。”吴景超还指出,改造中国的经济组织时,“别种实业的发展固然要注意,同时农业本身的改良,也不可忽略”[33],强调改良农业与提倡实业两者都要抓,要均衡发展,不可偏颇一方。同时陶希圣也指出了当时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中国多数的都市还只是商业性的都市。在这种郡市里,主要的事业是农村产物与外来的商品的交换。这种都市,在农业繁荣的时候,固然繁荣,但并不一定使农村富庶。他们的繁荣并不促进生产的进

步”[34]。郑林庄坚持“农村工业可做经济建设的一条路走”,他提出的“在农村里面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35]的设想,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倡“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其中一些政治主张在当时境遇下并不适宜,而且由于受知识分子自身政治现实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徘徊不定,这样他们所徜徉的政治主张很难转变成实际而被政府当局所采纳,但他们对乡村建设的理性探索,可以让我们感知他们对深处灾难中的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民族生死存亡关切,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通过广泛深入思考,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建设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乡村建设问题,这对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农业现代路径的选择与启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中国的乡村问题,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背景和立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的把对乡村问题的关注付诸实践,深入乡村,用实际行动来努力使这一现实困境有所改观;有的积极思考,用自己的理性和观察来关注现实批评现实。如何使中国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哪种路径走上现代化?如吴景超认为从发展都市以带动农村发展入手,工业发展可以吸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都市交通的发展可以带动农业运输,可以吸纳农村经济来扩充农村资源发展乡村建设。郑林庄认为要发展农村工业与改良农业技术并重才能解决农民问题。有的认为要大力发展农业教育;要节制农村人口数量规模;乡村建设要得到政府的广泛支持,要建立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多大,他们对于中国现实困境的关注是相同的,体现对农民群体的深切人文关怀,他们都希望能解决中国乡村的危机,希望国家能够逐步现代化。

《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建设的论争也并不是过眼烟云,人们最终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和都市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也最终意识到进行乡村建设的必要性。尽管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微弱的努力最终未能挽救时局,但这种努力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并对今天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着积极的启示。

时过境迁,虽然当今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已经绝然不同于过往,但仍旧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不仅影响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因此,“三农”问题仍旧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且围绕这一基本途径建立五大机制,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党和政府各部门合力、协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引导农民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建设自己幸福家园的激励机制;引导全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参与机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新农村建设实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改革,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总方针。尽管从社会

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上看,当下农业、农村的发展不可与30年代同日而语,但从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进程来看,我们今天的这种努力,仍可被视为对先贤所做努力的最新接续。胡适及其主编的《独立评论》关注农业问题,是其美国实验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虽然不能影响当时中国的政治导向,但体现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可贵探索,值得借鉴。

**注释:**

〔1〕〔4〕《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2〕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3〕徐晓旭:《独立还是依附——〈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派学人政治态度论析》,《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2期(下)。

〔5〕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第133页。

〔6〕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第125号,1934年11月4日。

〔7〕吴景超:《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独立评论》,第136号,1935年1月21日。

〔8〕〔9〕贺岳僧:《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独立评论》,第131号,1934年12月16日。

〔10〕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独立评论》,第196号,1936年4月2日;《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独立评论》,第199号,1936年5月13日。

〔11〕张培刚:《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独立评论》,第138号,1935年2月17日。

〔1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85页。

〔13〕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87-658页。

〔14〕〔15〕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27日。

〔16〕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27日。

〔17〕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独立评论》,第165号,1935年8月25日。

〔18〕吴世昌:《耕者肯有其田吗》,《独立评论》,第175号,1935年11月3日。

〔19〕吴景超:《土地分配与人口安排》,《独立评论》,第155号,1935年6月16日。

〔20〕巫宝山:《乡村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21〕钱实甫:《中国农业的"劳动不足"》,《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22〕陈序经:《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独立评论》,第126号,1934年11月11日。

〔23〕叔永:《农业教育与农业改良(一)》,《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

〔24〕叔永:《农业教育与农业改良(二)》,《独立评论》,第23号,1932年11月7日。

〔25〕符致达:《提倡耕种合作之必要》,《独立评论》,第153号,1935年12月19日。

〔26〕费达生:《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1月16日。

〔27〕董时进:《论复兴农村》,《独立评论》,第56号,1933年6月25日。

〔28〕张培刚:《近年来的灾荒》,《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

〔29〕董时进:《如何救济农民》,《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

〔30〕胡适:《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31〕何会源:《论田赋附加》,《独立评论》,第89号,1934年2月25日。

〔32〕董时进:《最近独立评论上引起的两个问题》,《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33〕吴景超:《讨论〈中国农民何以这样多〉》,《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3月29日。

〔34〕陶希圣:《都市与农村》,《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27日。

〔35〕郑林庄:《论农村工业》,《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年7月21日。

〔责任编辑:陶　然〕